

中国学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 共识与分歧

齐 皓◎

【内容提要】 近两年来，“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关键词之一。虽然新型大国关系是在中美关系的语境下提出的，但中国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认识更加宽泛，远超过中美关系的范畴。国内学界相关研究众多，但就如何定位新型大国关系存在严重分歧。从中国的外交实践来看，学界的分歧源于这一概念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向，中国官方对其内涵的阐释更多停留在原则层面。这个概念的泛化使用带来两个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的大国外交缺乏针对性，外界从概念上难以区分中国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是影响对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基础的构建。从中国最近发展对外关系的政策定位来看，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可能更加泛化，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一部分。

【关键词】 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 权力转移 和平竞争

【作者简介】 齐皓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电子邮箱：haoqi2011@gmail.com。

近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先后超过德国和日本从而跃居世界第二，并且在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甚至是安全领

域都开始施加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已经从 20 世纪 90 年代简单宽泛的“中国威胁论”转变为一些更加客观和具体的讨论，包括中国崛起将对国际体系产生何种影响；伴随着中国崛起，国际体系的权力过渡和转移能否和平地实现；现行国际制度和规范是否会发生变化；中美分别作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在未来权力和义务的再分配过程中能否有效地管控矛盾和分歧。^①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新的概念，并且不断尝试赋予这一概念以具体的内涵。2010 年 5 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中美应“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历史”。^② 2012 年 2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关系塑造成 21 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③ 2012 年 5 月 3 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④ 2013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习近平主席用三点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即“不冲突、

① 西方学者对中国崛起影响的一些讨论，可参见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3042/g-john-ikenberry/the-rise-of-china-and-the-future-of-the-west>; Charles 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479/charles-glaser/will-chinas-rise-lead-to-war>; John J. 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06, pp. 160–162,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5,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an-china-rise-peacefully-10204>.

② 《戴秉国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国新闻网，2010 年 5 月 25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5-25/2302977.shtml>。

③ 《习近平：要把中美关系塑造成 21 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在线，2012 年 2 月 16 日，<http://gb.cri.cn/27824/2012/02/16/2225s3559315.htm>。

④ 《胡锦涛：中美应打破大国对抗逻辑》，新浪新闻，2012 年 5 月 4 日，<http://news.sina.com.cn/o/2012-05-04/033424365185.shtml>。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①

从中国近两年提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缘起和发展来看, 这个概念被更多地应用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 并且中美都认识到, 在如何认知以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方面, 两国存在较大分歧。^② 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 虽然是中国首先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 但在中国内部, 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分歧要远远超过中美之间的分歧。中国学界和政策界仅从否定性的角度对新型大国关系有一个最低水平的共识, 即普遍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类型的大国关系, 不通过发动战争或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解决重大利益冲突; 但从肯定性的角度如何界定新型大国关系, 即什么国家之间建成什么样的关系才可以称之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内部的分歧十分严重。

中国国内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多元理解及对相关问题的观点分歧, 导致在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 中国无法向外界传递较为明确的信息, 即中国要构建什么样的“新型大国关系”。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问题, 对中国学界的有关讨论进行梳理和评析, 帮助读者理解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引发的困惑。这些问题包括: (1) 新型大国关系的主体; (2) 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和内涵; (3)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条件和障碍; (4)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

一 新型大国关系的主体

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一个新的外交理念, 在外交实践中需要有明确的指向性, 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对象是什么, 什么国家

^① 《习近平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新华网, 2013 年 6 月 10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0/c_116107914.htm。

^② 王缉思、仵胜奇:《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及中国对美政策》,《当代世界》2014 年第 10 期; 王义桅:《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认知有差异》, 环球网, 2014 年 11 月 16 日,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4-11/5192710.html。

之间可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学术角度说，需要对其中的“大国”有明确的定义。对这个问题没有清晰的认识，就无从得知要建立什么样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的语境下，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专指当今的中美关系，还是涵盖中国与所有大国的关系，学界的分歧很明显，外交实践也缺乏明确的指向性。对此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可以指称中国与所有大国的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其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之外的其他大国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其特指在崛起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发展一种新型关系，在当今时代的主体应是中美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的庞中英教授支持第一种观点。他提出两个理由，一是从中国外交政策的角度考虑，如果“新型大国关系”专指中美关系，会造成双重的负面影响。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国内有人“炒作”中国有能力超越美国，中国也这么认为则会步入“煮酒论英雄”的陷阱；就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言，会导致其他大国或者一些中小国家误认为中国将中美关系置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之上，造成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复杂化，甚至倒退。二是基于对官方文件的理解，他注意到，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中，使用了如下这些关键词：世界进一步走向“多极化”，中国主张建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尤其是“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他认为，根据这一为未来5年（2012—2017）确定中国外交政策方向的政治报告，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是专指中美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与俄罗斯、欧盟国家、印度、巴西的关系等也是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与二十国集团（G20）其他国家的关系也都是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包括新型的大国双边主义和新型的大国多边主义。^①

复旦大学的陈志敏教授持类似的观点，首先他承认新型大国关系这个

^① 庞中英：《新型大国关系不专指中美》，环球网，2013年9月9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3-09/4335238.html。

概念最初是在中美关系的语境下提出的,在中美关系上使用得最多,且新型大国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最突出。与庞中英的逻辑相同,他认为,如果将新型大国关系仅限定为中美关系,则意味着中国主动提出了一个类似于两国集团(G2)的概念,而事实并非如此。因此,他指出,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外交应该适用于中国和主要国际力量之间的关系发展,除了和主要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外,中国也应与具有超国家特征的地区国家联合体,如欧盟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他还建议把新型大国关系的英文表述“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改为“new model of relations between major countries”。^①

以上两位学者从中国政策实践的角度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主体进行论述,比较明确地反对将新型大国关系仅仅限定为中美关系。他们提出的理由类似于其他一些学者对中国拒绝两国集团(G2)概念的分析,即过分强调中美关系不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发展,而且违背中国倡导的多极化世界。^②

另外一些学者的分析跨越了对新型大国关系主体的争论,直接论述中国与具体国家的新型大国关系。复旦大学的吴心伯教授根据中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讨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他认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外交实践中,对不同的双边关系着力点应有所不同。^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季志业研究员指出,中俄关系开创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特殊方式,目前中俄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建立在一种平等、互利、互惠、双赢、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的。平等、健康、成熟的中俄关系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的范式,也为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提

① 陈志敏:《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态分析》,《国际观察》2013年第5期。

② 卫灵:《对中美 G2 的若干思考》,《中国改革报》2010年3月15日, http://www.crd.net.cn/2010-03/15/content_5144653.htm。

③ 吴心伯:《新型大国关系是盘大棋》,环球网,2013年1月11日,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3-01/3472577.html。

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① 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的高祖贵教授也同意这种观点，他在接受凤凰视频采访时表示，中俄之间的政治安全互信和经济合作同时在加强，中俄关系已经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②

还有一些研究更进一步，专门分析中俄和中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基础和动力。吉林大学的王生和罗肖认为，中俄关系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两国实力差距拉大、两国“政热经冷”和国际关系中大国制衡的基本规律，并对中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胡二杰认为，构建中印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印关系的最佳选择。从中国来看，中印关系是中国与发展中大国关系的典型代表，构建好与发展中大国的新型关系是中国崛起必须解决的核心命题。中印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双方有着对国际秩序的共同诉求，战略互信不断强化，这都为中印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内在动力。^④

第二种观点超越了中国对外关系的范畴，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北京大学的张小明教授承认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主要是针对中美关系，同时他还认为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为现实，主要取决于中美能否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他建议应从非西方大国崛起的角度论述新型大国关系，在他看来，新型大国关系主要指非西方大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21世纪是非西方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时代，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主张，表达了国际社会中新兴大国的一种战略诉求。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可以被视为一种非西方大国与西方大国一起维持国际秩序的国际制度立场。^⑤ 从这个角度出发，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国家与西方大国的关系都可以放到新型大国关系的

① 季志业：《中俄关系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样板》，新华网，2013年3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2/c_124489905.htm。

② 《中俄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凤凰视频，2013年7月4日，<http://v.ifeng.com/mil/annals/201307/c25e27bb-1188-4f6e-b1d0-1457d122a230.shtml>。

③ 王生、罗肖：《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与路径》，《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

④ 胡二杰：《关于构建中印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3期。

⑤ 张小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解读》，《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

讨论框架之中。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曲星研究员也将中美关系视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他在接受《新京报》访谈时提出,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基于我们希望解决后发国家与守成国家必然冲突和发生战争的历史“魔咒”。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和新兴国家、中国和欧洲国家都不是新型大国关系。因为金砖国家是后发国家,欧洲国家虽是守成大国,在国际体制中也有地位,但欧洲不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威胁,只认为是竞争,而且主要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竞争。关于新型大国关系是否对别的国家有借鉴意义,曲星认为,俄罗斯与美国也应该有新型大国关系。在他看来,尽管不比苏联,但俄罗斯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国家,美国仍然认为俄罗斯有很大的威胁。因此,美俄如果抛弃零和观念,也可建设新型大国关系。^①

不过,曲星的观点有待明确的地方。按照他的说法,中国、金砖国家和俄罗斯等都是后发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是守成国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避免后发国家与守成国家发生冲突。同时,他又认为中俄、美俄之间可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是中欧之间却不存在新型大国关系。这无法解释他所说的作为守成国家的欧洲国家不将作为后发大国的中国视为威胁。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苏联解体之后,北约不断东扩,俄罗斯和欧洲仍然存在安全竞争问题,那么,俄罗斯和欧洲国家是否也可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些观点上的矛盾只能理解为存在不同类别的守成大国和后发大国,不同的守成大国会用不同的态度对待不同的后发国家。

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大国”应有明确的定义。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明确反对用新型大国关系泛指所有大国的关系。他在接受人民网“强国论坛”的访谈时指出,新型大国关系是指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因此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的双边关系。他认为,美英关系、美俄关系、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都不是新型大国

^① 曲星:《中国需要怎样的“新型大国关系”》,新京报网,2014年6月15日, <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3/06/15/268374.html>。

关系，这4对关系历史上都曾有过，性质上一点都不新。只有崛起国与霸权国不进行全面战略对抗才属于新型大国关系。^①另外，关于新型大国关系和G2两个概念，阎学通认为前者不同于后者，G2是以中美两个大国合作为核心，新型大国关系则是以竞争为主线。^②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将新型大国关系专指中美关系，就不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中国外交的误解。

美国丹佛大学的赵穗生教授注意到中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实践，他认为，尽管中国已经根据现实主义传统与多极世界中的新兴“极”（包括俄罗斯、印度、日本、巴西和南非等国）谈及新型大国关系，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都没有提升到中美关系的高度。从实力来看，他认为只有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才堪称大国，因而必须携手“走出一条避免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共同构建一个基于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新模式”。^③

杨洁勉试图对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做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总结。在他看来，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内涵比较宽泛，兼具道义规范和解决问题的双重意义。根据他的理解，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两国，它包括美、英、法、德、日等传统大国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中国突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和原则诉求，强调国际关系的公正性、公平性和合理性。他注意到，中国陆续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是中俄关系、重点是中美关系、增长点是中国和金砖国家的关系、着力点是中欧关系、难点是中日关系等一系列命题。自然，中国在处理上述五类国家关系时需要解决的重点、亮点和难点也不尽相同。^④

从中国学界对新型大国关系主体的争论来看，导致分歧的根本原因是

① 阎学通：《美俄关系与中日关系都不是新型大国关系》，观察家网，2014年6月26日，http://www.guancha.cn/YanXueTong/2014_06_26_241158.shtml。

② 阎学通：《新型大国关系与G2论不同》，日经中文网，2014年4月18日，<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41-viewpoint/8917-20140418.html>。

③ 赵穗生：《中美应共同谋求世界权力天平“新的均衡”》，卜永光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9月下。

④ 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与政策建构》，《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

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没有共识。按照阎学通和赵穗生的观点,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是避免出现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全面战略对抗, 在当今时代, 新型大国关系的主体就是中美两国。曲星和张小明的观点也是基于类似的逻辑, 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大国”的理解不同, 曲星将俄罗斯也视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潜在对象, 张小明将非西方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放入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中。其他学者则将追求“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大国关系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 并且用这个标准评估新型大国关系, 如此一来理论上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用在任何大国之间, 只是在不同大国之间, 实现这些目标的紧迫性、难度、条件和路径都不同。

二 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和内涵

中国学界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另一个争论是其性质和内涵, 即如何定义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型”。这个问题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体争论关联紧密, 如果按照以上一些学者的观点, 将新型大国关系视作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大国关系, 那么, 必然会出现不同类型的新型大国关系, 其性质和内涵也就各不相同。

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和内涵, 学界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可以部分等同于中国和主要大国构建的伙伴关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在战略竞争基础之上; 第三种观点从大国的态度看待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态;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新型大国关系要超越竞争与合作, 实现最终的和谐。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从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来看, 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庞中英看来, 中国与世界一些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等关系, 都应看作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表现或实现形式。^① 这与陈志敏的观点相似, 他认为

^① 庞中英:《新型大国关系不专指中美》。

国家间关系存在七种形态，分别是热战敌人关系、冷战对手关系、恶性竞争关系、良性竞争关系、双边伙伴关系、传统盟友关系和共同体成员关系。只有良性竞争、双边伙伴和共同体成员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形态。他注意到，构建与有关大国的伙伴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交的一大主题，通过各种伙伴关系，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起各种合作机制，推动和落实合作项目，这确保了中国与这些国家总体合作的特征。因此，他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个全新的外交话语和实践。^①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将新型大国关系视为一种积极稳定的“和平竞争”关系。周方银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在战略竞争的基础上，但又保持双边关系平稳发展。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战略竞争，就不需要新型关系；如果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不能实现稳定合作，双边关系被战略竞争所单方面主导，那么，其形成的也不是新型关系。具体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他认为这是一种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稳定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全局性的和长期持续的稳定，而不是作为权宜之计的、基础并不稳固的稳定。实现这种稳定关系的重要前提，是中美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美两国分别明确对方的底线，并且不再轻易去测试或挑战这一底线。^②

阎学通教授用更加直观的说法指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他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是防止形成美苏式的军事对抗，而不是发展成为美英式的战略合作。因此，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是和平战略竞争，而不是全面战略合作。^③

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指出，要从战略的角度理解“新型”和“大国”两个关键词。根据他的理解，新型的大国关系首先是两个大国彼此尊重对方作为不仅是一般的主权民族国家，而且是国际社会内少有的和特殊的大国拥有的利益和尊严，尤其是紧要利益和基本尊严；其次是两个

① 陈志敏：《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态分析》。

② 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当代亚太》2013年第2期。

③ 阎学通：《美俄关系与中日关系都不是新型大国关系》。

大国之间的长期性历史关系不要陷入“伯罗奔尼撒式陷阱”，即相互对抗或全面冲突。^①

第三种观点是一种态度决定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杨洁勉研究员认为，相关大国的态度一般可以分为消极防范和积极经营两大类。消极防范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避免大国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而积极经营的新型大国关系重点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②事实上，这两种类别可以被视为两种状态，在大国关系中，这两种状态可能同时存在。例如，阎学通认为，中美之间有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和冲突性的利益。基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中美可以开展积极合作；基于冲突性的利益，中美可以开展预防性合作。^③但是，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合作的含义，如果将合作共赢视为战略合作，那么消极防范和积极经营难以共存。

最后一种观点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思考新型大国关系。复旦大学的苏长和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义桅教授从“和合共生”的角度看待新型大国关系，他们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摆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争霸的逻辑，创造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基础在于国际关系共有观念的转变。王义桅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三个超越：超越文明冲突，超越零和博弈，超越意识形态对抗。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是对西方理论路径依赖的超越，在本体论上坚持和谐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强调共同演化，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类关怀与大国担当。^④

苏长和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取决于是从对抗还是共生角度看待当前世界。共生关系的发展使得对抗作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减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从文明冲突转向文明对话，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一种对大国建

① 时殷弘：《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宏观思考》，《前线》2014年第7期。

② 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与政策建构》。

③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441页。

④ 王义桅：《以和合共生实现三重超越——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基石》，《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9月，<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916/c40531-22938665.html>。

立伙伴关系的预期。^① 根据他的观察，一个更具共生特点的国际体系开始逐渐出现在国际安全领域，即新兴大国追求结伴和守成大国巩固结盟的并行现象，这在西方历史上的权力转移过程中不曾有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在于结伴体系与结盟体系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这既取决于结伴力量自身的发展，也取决于结盟力量内部的分化。他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关系发展为例，认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结伴外交实践已经开始对美国的结盟体系产生微妙的影响。

三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条件和障碍

（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

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个新的外交理念，如果要对中国外交产生长期的影响，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何在？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不是为了达到以往外交理念不能实现的目标？学界根据对其内涵的不同理解给出了以下三种不同的答案。

第一种观点从中国的战略需求和管控分歧的角度，阐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张小明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预防性外交，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崛起面临巨大国际压力，中国不希望成为美国的对手，新型大国关系主张更多的是一种防御行为。^② 赵穗生认为，中美力量差距仍然很大，中国领导人作为现实主义者明白中国无法承担同美国全面对抗的代价。中国将 21 世纪的前 20 年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战略机遇期”，因此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该概念实际是“和平共

① 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9 期。

② 张小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解读》，《国际政治研究》2014 年第 1 期。

处”的另一种表达。^① 这两位学者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崛起的需要。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是防止因中美权力转移引发恶性冲突或战争。

但是要防止中美发生恶性冲突，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上，需要建立一些具体的合作和沟通机制。日本国立新潟大学的张云认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意义就在于让中美关系更具机制化和可预测性。按照他的观点，中美都认为自身的行为有强大逻辑和合理性，很难要求对方按自己的逻辑行事。因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就是要承认和尊重对方的逻辑，建立从元首到各层级和各领域的定期沟通平台并实现机制化，特别是最高级别的定期沟通，实现双方关系的可预测，减少风险，管控危机。^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战略研究院的钟飞腾仍将中国视为一个经济意义上的大国。他认为，中国通过融入开放性世界经济，在人均收入还不太高的情况下，取得了经济大国地位，这一特性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大国。由于中国极大地依赖外部环境来获得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它希望通过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进一步保障这种外部环境。^③

第二种观点从更加宽泛的视角看待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意义，这些视角超越了中美双边关系，将新型大国关系上升到发展中国外交思想、承担大国责任和维护地区秩序的高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阮宗泽研究员提出三点意义：首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思想的生动体现。其次，在各国相互依存度日益紧密的今天，拓展大国之间的关系需要新思路。中国领导人率先倡导中美努力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正是面向未来

① 赵穗生：《中美应共同谋求世界权力天平“新的均衡”》。

② 张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爱思想网，2013年6月22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037.html>。

③ 钟飞腾：《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发展与中国外交新理念》，《国际论坛》2014年第1期。

的责任担当。最后，中美如何相处将决定亚太地区的未来。^① 复旦大学的吴心伯教授表达了相似观点，他认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基于推动国际政治转型的崇高理想。^②

第三种观点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视作中国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开始。按照陈志敏对其发展路径的描绘，新型大国关系只是中国外交的一部分，本着新型大国外交这一精神，中国应该主张建设更为全面的新型国际关系。从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主体出发，中国的新型国际关系外交既要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外交，也要包括新型大国与小国外交，以及新型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外交。当中国重新成为真正的大国，在处理国家间主权平等问题的同时，又要兼顾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影响，需要用新的观念来发展新型大国和小国的关系。^③

（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和障碍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它能否实现，或者说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虽然中国学界就如何定位“新型大国关系”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可能性、条件和障碍的问题，大部分研究集中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或者完全将“新型大国关系”等同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④

中国学界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的研究大多是从其条件和障碍出发，讨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有利条件，国内学者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时代和国家性质都

① 阮宗泽：《中美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吗》，《党建》2013年12月30日，http://www.dangjian.cn/gjgc/201312/t20131230_1667401.shtml。

② 吴心伯：《新型大国关系是盘大棋》。

③ 陈志敏：《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态分析》。

④ 在中国知网（CNKI）中检索以“新型大国关系”为篇名的中文社科核心期刊文章，2012—2014年共有178篇文章，其中有148篇文章直接讨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条件和障碍等问题。

发生了变化。周方银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只是中国政府主观意愿的产物,而且也有颇为深厚的时代和现实利益基础。二战后,核武器出现、民族主义普遍兴起、主权规范得以深化和经济相互依赖深入发展,国际政治中出现了一种大国无战争状态,以和平方式进行权力竞争是这个时代大国关系的特点。^①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教授认为,从国家性质来看,中美两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都属于文明型国家行为体,这与历史上的崛起国和挑战国(如德国、日本)具有不同的特点,这种特质也正是中美得以用合作与和平方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条件,具有一定的“天然性”趋势。^②

二是面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中美必须合作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陶文钊认为,气候变化、传染病、恐怖主义等问题已经具有全球性威胁,中美必须合作应对这些问题,中美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是互利双赢的,可以避免零和竞争。^③

三是中美之间有良好的沟通机制。金灿荣认为,中美关系的实践表明,中美对话机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适时对危机进行管控。在众多的中美对话机制中,有些机制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每一次谈判或多或少都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协商气氛,为其他机制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对话机制的主要功能就是加强战略信任,通过沟通与协商,知道对方的利益诉求,寻找合适的解决途径,使双方容易产生合作的态度,而不是彼此敌对和猜疑,从而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④

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阻力和障碍,学界的研究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美权力竞争不可避免。周方银认为,在中美权力转移的过程中,美国的抵触情绪不可避免,它会采取预防性措施,降低权力转移给

① 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

② 金灿荣、赵远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

③ 陶文钊:《中美缘何可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国情国力》2014年第1期。

④ 金灿荣、赵远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

美国带来的利益损失。关于利益，周方银认为除了经济、安全利益之外，中美还在国际地位方面存在竞争，这种竞争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①

第二个层面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各种具体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一是与中美关系直接相关的问题，这既包括一直存在的新疆、西藏和对台军售问题，还包括近些年出现的网络安全和人民币汇率摩擦。二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三是中美战略互信的缺乏。

国内学界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明显多于对新型大国关系本身的研究，但对于这些具体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学界存在不同认知。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损害了中美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在美国。^② 庞中英以“斯诺登事件”为例指出，在美国占据相对和绝对优势的领域，如互联网，美国尽管也需要别国的合作，但是，美国的主导是主要的，而国际合作则是次要的，他认为美国不会因为外界的批评而放弃监听计划，中美不大可能在网络安全方面形成新型大国关系。^③ 南开大学的韩召颖教授认为，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存在反应过度，有夸大中美权力转移带来的危险的倾向，中美关系有可能从非敌非友向敌对方向发展。^④ 另外一些研究认为，不应从完全负面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如阎学通认为，中美之间很难有互信，没有互信也可以进行合作，互信应该是合作的结果而非原因。中美应该发展基于共同利益的积极合作和基于冲突的预防性合作。

第三个层面是关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模糊性对新型大国关系前景的影响。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和中国战略发展基金会

① 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

② 王嵎生：《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可能吗？》，环球网，2012年12月29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2-12/3431583.html。

③ 庞中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说易行难》，爱思想网，2013年7月2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332.html>。

④ 韩召颖、王石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负面影响》，《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7期。

主席朱惠忠认为,在核武器时代,中美关系有可能打破历史“魔咒”,但需要中国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研究。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提出的这个概念仍停留在原则层面,缺乏对具体措施的研究。这使得美国将中国的提议作为权宜之计,因此其不会认真应对。^①

四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

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中国学界的争论聚焦于不同目标决定不同路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思路:一是从权力再分配和战略平衡的角度讨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二是设置不同目标层次,匹配具体措施;三是超越双边关系,将共同发展作为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

时殷弘认为,要讨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首先需要有一个“战略终点”设想,这个设想就是有关中美之间权力分配的变化。他指出,美国要均衡地理解不同功能领域和地理区域内的实力和影响力对比,采取“选择性优势”而非“全面优势”。例如,美国对中国在 GDP、对外贸易量和在亚洲领先的外交经济影响力方面要有认同,而中国也要认同美国在较长时期保持其军事优势和拥有在某些地理领域相对于中国的外交优势。在世界金融和安全的体制性安排中,中美两大国的正式影响或权势分配将大致符合这两大国在相关功能领域内各自拥有的实力和各自做出的贡献,这也意味着中国的贡献相对于中国增长了的实力而增进,美国的相对权势则相对有所缩减。

关于如何实现这种权力和义务的再分配,时殷弘指出,中美两国首先要改变几种外交国务做法,如少索取少给予、少索取不给予,甚至是在美国方面较多见的多索取不给予,进而尽可能地排除国内外多种干扰,积极尝试践行战略性的多索取多给予。这是历史上强国之间实现基本稳定的“最终解决”所要采取的办法。在中国方面,时殷弘认为中国必须持续地

^① 薛理泰、朱惠忠:《论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性及挑战》,《领导者》2013年6月。

进行一种“战略推压”，步步劝使甚至迫使美国退让，从而经过一段历史时期去实现上述和平的“最终解决”。^①

与时殷弘的观点类似，周方银也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终极形态”进行了描绘，他认为在复杂利益结构的基础上，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不会是中美之间不经过一定程度不同形式的较量就积极主动相互示好的产物，这样的结果既不会轻易出现，从内在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从现实来说，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一定程度上形成的具有较强稳定性的战略僵持状态的结果，是中美双方都无法实现自身理想意图的产物。^②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些较为具体的对策建议。一方面，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越来越接近权势转移的关键阶段，对双边关系进行管理的需求和压力呈增大趋势。中国需要掌握好其中的变化节奏，避免这一过程以十分意外的方式发生，以保持这一过程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可以通过较为有效的意图阐释、认知调整、行为改变以及制度安排等领域的创新，与这个实力对比的变化过程进行有效适应，从而使其以更为平稳和对双方更少伤害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较为稳定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需要以斗争求合作，对美方的不合理做法进行适度强硬的反击，在维护重要利益方面显示坚定性，这将有助于美方以更为务实的态度来处理中美关系，并对新型大国关系形成比较稳定、一致和切合实际的预期。^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达巍研究员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点概括，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应该被视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从低到高，需要不同的实现路径。^④“不冲突、不对抗”是最低层次目标，这需要维护中美的战略相互依存，“中美核力量平衡、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中美共同面临

① 时殷弘：《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宏观思考》。

② 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

③ 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

④ 达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

的全球性威胁、中美社会文化联系”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四根支柱。达巍认为,就这个低层次目标而言,中美已经具有一种低水平的新型大国关系。针对“相互尊重”,达巍指出这一层次的核心目标是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但是他认为针对中美各自的核心关切和重大疑虑,要建立高水平的战略信任十分困难。因此,要在中层路径上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恪守渐进主义路线,寻找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中间点并逐渐向之推动,不宜抱有一举解决所有问题的过高期待。最后,要达到最高的“合作共赢”的层次,达巍认为中美应该将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狭义的国家利益、维护和建设国际制度作为合作的目标。

陈志敏也将新型大国关系分为不同层次,但他的分类更具学理意义和普遍性。他将良性竞争关系、伙伴关系和共同体成员关系作为新型大国关系三个可能的形态,按照他的说法,这三个形态是并存和递进的关系,即从低阶新型大国关系到高阶新型大国关系。首先,他认为新型大国关系要具有良性竞争的初始形态,需要中国采取四点对策:拓展共同利益,以压缩恶性竞争的空间;制定良性竞争的规则,让竞争在健康的轨道上进行;采取更为平常的心态,来看待国际竞争或国家软制衡的现象;明确战略底线,以遏制恶性竞争的发展。其次,在发展伙伴关系这个层次上,中国可以继续推行在过去 20 年中行之有效的伙伴外交战略,并通过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将大国合作层层推进,如从“合作伙伴”到“全面合作伙伴”,再到“全面战略伙伴”,以至具有一定准联盟性质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最后,他认为共同体成员是一种理想形态,考虑到国际政治的现实,这样的前景不必然会实现。^①

以上学者从(中美)权力再分配和双边互动的角度分析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按照他们的观点,能否建成新型大国关系取决于大国能否良性互动、和平解决权力转移带来的问题,并最终形成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

^① 陈志敏:《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态分析》。

不互信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恐怕永远达不到一个真正的互信。因此，他认为中美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不在于两国外交家如何处理双边关系。^①他注意到，美方关切的具体问题多数是一些“移动的目标”。美国在若干年前关切的是伊拉克问题、利比亚问题、本·拉登和“基地”组织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而待这些问题解决或缓解之后，又集中到朝核、伊核、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如果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同这些无穷无尽的移动目标捆绑在一起，是难以找到出路的。因此，他主张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是坚持各自认定的发展道路，即各自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他引用基辛格的说法，认为中美应该建设一种非零和的“共同进化”的关系。^②

五 中国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从两年多的外交实践来看，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仍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这种概念的模糊性表现为两点：一是没有区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其他新型大国关系的差别；二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没有明确说明，或者说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似乎存在多重目标。这带来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外交层面的问题。第一，将新型大国关系同时应用于中美、中俄、中欧、中印甚至是中日关系，这不但从概念上无法区分中国与大国之间关系的异同，还会使外界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产生误解。从这点来看，新型大国关系除了将侧重点放在“大国”之上，其实际作用不及以往提出的各种伙伴关系，如“战略协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伙伴”关系等，这些不同提法尚可使外界了解中国外交的针对性。第二，如果不明

^① 王缉思：《中美或永远达不到真正的互信》，大公网，2013年11月18日，<http://news.takungpao.com/world/exclusive/2013-11/2046992.html>。

^② 王缉思：《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14年3月16日，<http://www.ciss.pku.edu.cn/ueditor/net/upload/file/20140813/6354349448281485577423276.pdf>。

明确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或者不根据其多重目标设计不同的政策手段,新型大国关系在外交实践中只能停留在原则和精神层面,不具有可操作性。

其次是对构建理论的影响。新型大国关系目标的模糊,使得学界无法区分中国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侧重点是应对恶性战略竞争,还是推动战略合作。很明显,实现这两个不同目标,需要不同的条件和路径。另外,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是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对中国的反应不同,如果用新型大国关系泛指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或者不对这些关系加以区分,就无法将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个有效的研究框架,为中国的大国外交和中国崛起提供理论基础。

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个新的外交理念,其概念的建构必然经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如杨洁勉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个新生的概念,正处在逐步发展的进程之中,既包括国际社会特别是相关大国的现实考虑和期待,也包括从政治词汇向学术语言转换的理论建构,而这种理论建构目前尚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在其时代背景、理论体系、主要内涵、不同类别、基本议题和指导、操作意义等方面继续发展和完善。^①因此,随着中国大国外交的不断发展,这个概念将会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还是继续停留在原则层面,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事实上,回顾中国外交理念发展的历史,新型大国关系确实不是中国外交中一个全新的概念。钟飞腾注意到,中国推动建立新型关系的提法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就存在了,当时中国领导人以俄罗斯为对象,提出过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关系原则,随后中国同一批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2000 年 1 月,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江泽民提出“这十年中,我们还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2001 年 7 月,江泽民在莫斯科大学演讲时三次提到“新型国家关系”,并在“三不”的基础上增加了

^① 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与政策建构》。

“完全平等、互利合作、睦邻友好”等性质。^①

从概念的变化来看，虽然之前出现过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领导人强调的重点是“新型”，即不论国家实力、规模差距大小，都不冲突、不对抗、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合作。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近年来对自身的大国地位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此时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更多地侧重“大国关系”。但是，从中国最近的外交定位来看，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似乎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

在 2014 年 11 月 28—29 日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一是他将周边外交置于大国关系之前。^② 有评论认为，习近平的讲话表示中国更加重视周边外交，他在讲话中对“新型大国关系”一语带过，而且没有直接提到美国，这意味着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关注会减少。^③ 二是他强调中国必须有具备自身特色的大国外交，并且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这两点来看，正如陈志敏描绘的新型大国关系发展路径，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正在朝两个方向发生变化，一是逐渐明确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二是从新型大国关系到新型国际关系。这些变化说明中国可能将越来越少地强调外交对象的差别，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将重点放在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上面，与各种国家发展新型关系。对新型大国关系而言，这意味着其概念将继续停留在原则和精神层面上，针对性可能进一步减弱。

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是作为一个外交理念被提出的，学界对这个概念的研究兴趣和观点分歧始终受到政策导向的影响。从中国外交的最新定位来看，新型大国关系很可能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因此，本文预测，中国学界在过去两年中的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

① 钟飞腾：《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发展与中国外交新理念》，《国际论坛》2014 年第 1 期。

②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4 年 11 月 29 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15440.shtml。

③ 《外媒评习近平外事讲话：外交姿态放低还是放弃韬光养晦》，凤凰网，2014 年 12 月 2 日，http://news.ifeng.com/a/20141202/42616007_0.shtml。

兴趣可能将告一段落，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将吸引更多的研究注意力。

六 结论

本文梳理了中国学界围绕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新概念的一些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学界的共识主要集中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首先是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的共识，即认为中美有必要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历史上崛起国和守成国因权力转移发生恶性竞争；其次是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有较大共识，包括中美之间的相互核威慑、全球化下的经济相互依存、中美共同面临的各种全球性威胁和中美之间存在的各种危机管控机制，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条件至少可以保障中美关系“不冲突、不对抗”；最后是障碍和阻力，学界对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有共同认知，如美国重返亚太，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为代表的第三方因素和中美缺乏互信等，但是这些因素对中美关系构成何种程度的影响，学界存在不同认识。这些共识的存在源于学界对中美关系之间的权力转移有明确认识，并且认识到从政策实践来看，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问题最为突出。另外，由于中美关系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学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较为广泛，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研究相对成熟，因此对影响中美关系的很多具体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共识。

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体和性质这两个影响新型大国关系如何定位的问题，中国学界存在严重分歧。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如何定义新型大国关系的“大国”，是一般性大国还是具有权力转移意义的相关大国；二是新型大国关系是建立在战略竞争还是合作的基础上。学界对这两点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策指向的不明确。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仍较多地停留在原则层面上，如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来进行概括，这些可以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却无法明确地体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和意义，以此为标准，很难确定新型大国关系的主体

和内涵。

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来看，这个概念经历了从早期强调“新型关系”到近几年来强调“新型的大国关系”，再到最近习近平主席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自身实力的认识是影响概念发展的主要因素。从最近的外交定位来看，新型大国关系将融入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两个更大的外交理念中，这不仅意味着它的内涵将继续停留在原则层面上，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外交理念也将逐渐式微。